

T a o x i n g z h i y u X i a n d a i M i n g r e n

徐明聪◎著



陶行知
与

现代
名人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T a o x i n g z h i y u X i a n d a i M i n g r e n

徐明聪 著



陶行知
与

现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陶行知与现代名人

徐明聪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30 千字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ISBN 7-81093-410-4/K·32

定价:2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陶行知生平事迹概况

陶行知（1891—1946）是近现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陶行知原名文濬，后改知行、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他自幼聪敏好学，早年毕业于



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在伊利诺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和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等职。陶行知早年抱有改革教育使人民大众受教育的宏愿，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他知识渊博，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且又身体力行。从20年代起，他抱着救

国救民之心,创造性地开展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运动,创立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他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组织了普及教育助成会、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一二·九”运动后,陶行知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6年7月,他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赴欧、美、亚、非的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主张。1938年回国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抗战胜利后,他又站在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前列,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1946年7月25日,深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陶行知,由于劳累过度,猝然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和创造的一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领导下,由一名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教育事业呐喊奔走的爱国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著作宏富,论述精当”,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十分丰富。他在实践中创立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基本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其基本精神是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主张教育要从劳动人民实际需要出发,为改善劳苦大众生活服务。他的教育思想与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对当前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陶行知曾三次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戴上了“三顶大帽子”:一是1928年在晓庄师范学校,由于王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盲动主义思想影响给陶行知扣上了“改良主义”的帽子;二是30年代陶行知发表文章,强调“教人少生孩子”,被扣上了“新马尔萨斯”的帽子;三是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连带批判陶行知,说他的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由于以上的错误批判,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研究长期成为禁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使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得到正常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世界影响也日益扩大。

殷殷之情系陶研

——《陶行知与现代名人》小序

徐明

陶行知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陶行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领导下,由一名为中国劳苦大众的教育奔走呐喊的爱国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一名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为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安徽是陶行知先生的故乡,也是率先在全国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和实践的省份。徐明聪同志一直在安徽省陶行知研究会工作,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20多个春秋中,在当前物欲横流的时代中,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始终如一地以陶行知“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精神从事陶研工作,他甘于清贫,淡泊名利,精神可嘉。多年来,他除了主编《行知研究》刊物外,还在国内多家刊物上发表陶研学术论文30余篇,并于陶行知诞辰110周年之际,撰写了20余万字的陶研专著《陶行知评传》,他还与同事一起合作编写了《陶行知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和《学陶师陶一百题》等书。

《陶行知与现代名人》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这本书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真实地再现了陶行知与他同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及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的亲密交往与友谊,同时也着重阐述了他们之间的教育思想、美育思想和哲学思想等方面的异同点。关于教育方面,书中涉及了现代教育理论、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幼儿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本书在教育界首次将陶行知与他同时代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集中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而且也使人们对正确评论陶行知在我国现代教育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陶研工作者了解陶行知和研究陶行知所应具备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今年是陶行知诞辰 115 周年,逝世 60 周年。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谨向广大读者推荐此书,以示对陶行知先生的深切怀念。

2006 年 4 月 16 日于北京

(方明同志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原全国教育工会主席,现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目 录

殷殷之情系陶研

——《陶行知与现代名人》小序·····	方 明(1)
毛泽东与陶行知·····	(1)
周恩来与陶行知·····	(11)
徐特立与陶行知·····	(23)
黄炎培与陶行知·····	(32)
蔡元培与陶行知·····	(41)
陶行知与陈鹤琴·····	(51)
陶行知与杜威·····	(66)
陶行知与胡适·····	(75)
陶行知与郭沫若·····	(85)
陶行知与冯玉祥·····	(94)
陶行知与沈钧儒·····	(108)
陶行知与史量才·····	(121)
陶行知与翦伯赞·····	(129)
陶行知与田汉·····	(135)
后 记·····	(147)

毛泽东与陶行知

毛泽东（1893—1976）与陶行知曾在历史上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这两位伟人虽从事的事业不同，但在教育及哲学思想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内战政策，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但也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呼吁各党各派各军各界都应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等50余人，于1936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大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并参与起草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宣言》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

同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出国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途经香港时，他和在港的邹



韬奋、胡愈之一起商讨并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文件，然后由邹韬奋带回上海，再和沈钧儒、章乃器等讨论修改后，便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署名发表。这个被誉为“团结御侮”的纲领性文件，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这个文件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事后陶行知曾兴奋地写了一首诗：

大祸已临头，其豆忍相煎。

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团结御侮文件详尽地阐述了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领袖关于建立救亡联合战线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他们认为：第一，抗日救国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只有集合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实行全民总动员，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第二，我们主张各党派各方面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并不是说把各党各派都消灭了，更不是利用联合战线把某党某派消灭。在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和民众，中央和地方，也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只要在抗日救国这一问题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第三，在联合战线中间，不仅要大家互相宽容，而且要公开、坦白。凡是利用联合战线，利用抗日名义，作个别的企图的，就是破坏联合战线，也就是破坏抗日运动。第四，联合战线的主要目的，是在扩大抗日救国的队伍，这支队伍自然越广大越好。既然是中华民族革命联合战线，那么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间，除了汉奸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应该摒弃的。第五，民族联合战线决不是一种短命的过渡性质的结合。只要大

家真正能够诚意合作，对于联合战线的前途，真正有坚定的信仰，那么联合战线的基础只会不断巩固扩大起来，直到抗日救国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并且在胜利之后也不会分裂，渐次达到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

文件还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对于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则提出严厉批评：“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惟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故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则认为“中国共产党于去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

团结御侮文件首先刊登于香港《生活日报》，接着《生活教育》、《生活知识》、《民族阵线》、《救国时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并印成小册子在香港、上海等地流传，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

当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下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四先生》公开信，代表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团结御侮文件及救国会的其他宣言、纲领。他说：“这些文件引起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

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信中最后强调：“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当毛泽东发表这封信时，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的陶行知已在海外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了。



陶行知

与 现代名人

蘇維埃政府領袖

毛澤東先生致章陶鄒沈四先生信

關於團結禦侮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討論

毛澤東先生的這一信是從英法方面得來的英文譯稿，再轉譯成中文，也許在字句上與原文會有差別之處，依覺得中文原本以後即當再行發表，請毛先生與讀者原諒。至於毛先生這一信的偉大政治意義及由此而顯示出的團結禦侮光明偉大的前途，每個讀者都可完全明瞭，用不着任何註釋的。 編者

乃器、行知、相齋、灼儒、諸先生及全國救國聯合會全體會員們！

不久以前，我們在報紙上讀到了章沈陶鄒四先生所發表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和全國救國聯合會的宣言和綱領。這些文件引起了我們極大的同情和滿意，我們認為這是代表全國大多數不願意作亡國奴的人們的意見與要求，我代表我們的黨、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表示誠懇的敬意，并向你們和全國人們聲明：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誠懇的願意與你們合作，與一切願意參加這一鬥爭的政派的組織或個人合作，以便如你們所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樣，去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 你們說

萬的金錢，並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很快的侵入中國的內地。雖然他們還未取得澈底的勝利，可是對於國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勞與幫助。現在沒有任何人能說東北義勇軍不能單獨抗日的了。我們紅軍在一切方面都不比東北義勇軍弱，而北方人民的愛國熱情亦不落後於東北人民。如果不是想混亂人民耳目的話，那麼就說，假使東北紅軍不能單獨抗日。上海抗戰和蘇聯抗戰失敗的原因，只是因為當時領導者的動搖不堅定，沒有運用緊張的運動戰術，沒有充分廣泛的與人民合作，然而，中國紅軍是沒有這些弱點的，所以我們認為紅軍能夠單獨抗日，並不會輕受挫折而能持久抵抗。雖然紅軍不能期待以現有的力量，達

毛泽东公开复信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团结御侮宣言，并愿与救国会亲密合作，共同推进抗日救国斗争。

二、相聚山城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来之太不容易了，就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的气氛中时，国民党政府却发出道道“金牌”，阻止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歼灭顽固的残敌，而且纠合日伪军一起抢夺胜利果实。国共两党摩擦频频，挑衅者受挫，内战阴云密布。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当局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陶行知和许多进步人士一样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8月28日，毛泽东毅然由延安飞临山城重庆。



毛泽东与陶行知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陶行知多次受到接见。图为毛泽东于1945年10月11日返回延安时，陶行知等到机场欢送，并与毛泽东合影。右一为陶行知，右二为陈诚，左一为张治中。

张澜、沈钧儒、陶行知、黄炎培、郭沫若等人冒着八月的酷热，到九龙坡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



周恩来，接着，毛泽东、美国特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相继步下舷梯。陶行知和在场欢迎的人群一起热烈鼓掌。周恩来向毛泽东一一介绍了欢迎者，当介绍到沈钧儒与陶行知时，毛泽东立刻记起了他们是《团结御侮宣言》的倡议者，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并连声“谢谢”！毛泽东亲临山城重庆，事关中国当时局势及未来历史，山城群情激动。9月2日晚，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欢迎酒会，陶行知也应邀出席了欢迎晚会。毛泽东、周恩来在酒会中热情洋溢，谈笑风生，处处显露出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坦荡的风度。宴会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走在大街上向人群热情招手，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反映了人民大众对和平民主渴求的心声，陶行知也融汇在这欢乐的人流中。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军腾出了他在上清寺的官邸——桂园，供毛泽东会见各界人士之用，毛泽东会见文化界人士时，陶行知也应邀参加了。桂园是他熟识的地方，因为张治中将军素来敬重陶行知的人品，支持他所办的教育事业，他们之间常有往来。但是，毛泽东白天在此会客，周围名为警卫、实则监视的明岗暗哨重重，陶行知进出于严密的监视网中，不用说要冒多大的危险。不过，他知道，这些家伙目前还不敢明火执仗，只是暗箭需防。他特别关照育才学校在重庆办事处管家巷28号的工作人员，要留神门户，谨防便衣特务闯入。他在自己卧室的窗旁放了一捆粗麻绳，绳的一端系于窗户，遇有危险，可以由室内手执绳索下滑到街上。

重庆谈判历时43天，经过中共代表针锋相对的斗争，《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公布了。10月8日，重庆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济济一堂，出席张治中先生举行的宴会。在这个热烈而隆重的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宴会上，毛泽东即席发表讲话，透彻地阐述了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指出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但中国人民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建设出一个崭新的中国。透过毛泽东铿锵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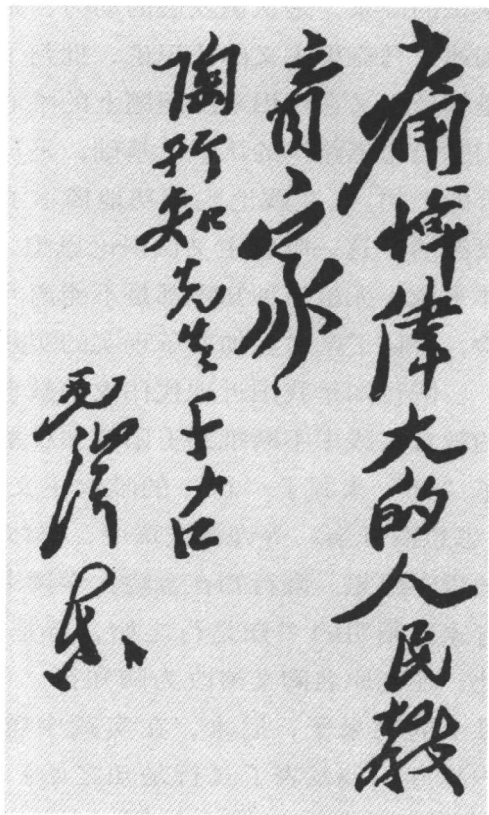
越之声，陶行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时，陶行知代表民盟中央前往机场欢送，并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留下了两位伟人历史上辉煌的一页。

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7月25日，继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不到一个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暗杀黑名单第一的陶行知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与世长辞。噩耗传开，如同晴天霹雳，举国为之震动，四海为之同悲。延安、重庆、上海、南京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国际友人无不哀思痛悼。7月26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电唁全国。电文如下：“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的社论。

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两千多人在边区参议厅隆重举行追悼会，沉痛悼念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陶行知。追悼会上，毛泽东还亲笔挥毫写下“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的挽联，也



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

算是对陶行知光辉灿烂一生的一个总结。

四、“实践论”和“知行行论”的哲学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当我们重温毛泽东著名论著《实践论》，再对照一下陶行知的《知行行》生活教育理论时，会惊奇地发现，这两位同时代的伟人虽然走的是不同的救国道路，却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基本精神近乎一致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著名论著《实践论》是一部划时代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系统地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认识的真理标准，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倾向。《实践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实践论》成功地揭示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毛泽东指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了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批判王阳明和杜威的唯心主义思想，逐步确立了“知”来源于“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他的《知行行》、《思想的母亲》等许多文章中，都体现了和《实践论》近乎一致的哲学思想。陶行知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曾认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观点是对的，为此，还把原名陶文潜改为陶知行。可陶行知毕竟不是一个唯书、唯上的书呆子，后来，在实践中感到王阳明的观点是错误的。1929年，他发表了《行是知之始》一文，举了许多例子论证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把王阳明的唯心主义知行观颠倒了过来，陶行知不仅把王阳明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

